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21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0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6,000册

书号11310·46 定价1.50元

内部发行

DH193/69

目 录

文 献

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斗争历史的回顾……………薄一波（ 1 ）

回 忆 录

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在淮海战场上……………滕海清（ 16 ）

资 料 概 述

淮海战役综述…………… 南京军区《淮海战役综述》编写组（ 30 ）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新军概况

…………… 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 63 ）

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概况

…………… 山西新军第二纵队史料征集组（ 84 ）

专 题 资 料

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武汉的经过及

在汉情况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113)
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机关自武汉迁上海的经过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征集编研委员会	(128)
福建查田运动的前前后后	中共长汀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32)
拉法、新站战斗有关简况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吉林蛟河县委党史办公室	(148)
英雄的红军第三十四师	朱光梅	(154)

大 事 记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记事	傅国祯 周宏雁	(167)
附 录:		
《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至第二十辑目录		(232)

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斗争历史的回顾*

薄 一 波

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策略的产物，作为我党领导之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团体和军事组织，在抗日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

牺盟会以及山西新军的斗争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抗日斗争光辉史册的重要一页。成立牺盟会，最初是由当时“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阎锡山所属各团体的核心组织）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倡议的。成立不久，由于种种原因，陷于停顿。一九三六年十月，北方局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到山西工作时决定成立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公开工委）它直接归北方局领导。最初的成员是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同志和我，由我担任书记。我们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接手牺盟会之后，就在党中央、北方局的正确方针

* 本文是薄一波同志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在纪念牺盟会成立五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的主要部分。文章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和策略指导下开展工作。中共山西公开工委，结合山西的实际情况，执行党中央、北方局的方针和策略，具体领导了牺盟会以及后来建立的山西新军的斗争。这个委员会，专门做抗日救亡工作，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得名叫公开工作委员会；在组织上则是秘密的。按照北方局的规定，它同由张友清同志负责的专门领导党的秘密工作的中共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十月后改为中共山西省委）不发生横的联系。公开工作委员会是个松散的组织，没有专门的会议制度，也没有用它的名义做过成文的决定和指示，基本上是用碰头的方式来商量工作和进行领导。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委员会的成员陆续又增加了十一位同志，都是经过北方局个别派来的，他们是：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傅雨田、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当时在党内只有极少数同志知道有这个组织。

牺盟会以及山西新军的历程，大体上经过四个阶段，即创建阶段、大发展阶段、反磨擦阶段，以及“十二月事变”后的那个阶段。在最后那个阶段里，为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牺盟会继续活动大约一年，而山西新军则加入八路军序列继续坚持敌后抗战。每个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的具体工作重点和策略运用也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大致是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在这将近一年里，我们接手并改组了牺盟会，开展了

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特别是训练军、政干部、组建新军的工作。这期间，我们的工作主要放在站稳脚跟、抓住实权、推动抗日上。

一九三六年，日本正加紧侵略华北，阎锡山在山西的长期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同时，阎锡山和蒋介石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蒋介石策划河东道独立，企图夺取这块地盘。红军东征，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回师陕北后，毛泽东主席曾致书阎锡山，敦促其联合抗日。在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山西当局的上层内部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变化。这时，阎锡山构想了一个“新”策略：请一些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以山西抗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打着山西的旗号，仿照共产党的某些措施，用这种办法来应付时局危机，度过难关。从我们党来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利用山西出现的形势，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推动阎锡山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破一点，去影响全局，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发展。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阎锡山邀我回山西工作。经北方局批准，我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作为抗日救亡人士应邀来到太原。动身前，我向北方局汇报了我九月间回太原时所了解的情况，认为在那里可以有所作为，并提出了回山西后的工作方针：站住脚跟，不作“清客”，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做山西当局根本不能接受的事情；踏踏实实地做上层统战工作，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踏踏实实地

做群众工作，积聚力量；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个方针，得到了北方局的批准。

到太原后，我很快同阎锡山见了面。依照上述工作方针的精神，向阎提出了三点要求。我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不是作客，按照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有几点说清楚了以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的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东西都做，不利的东西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一一表示同意。从此开始，我们逐步地同阎锡山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

阎锡山知道我们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营救”我出狱并邀我回山西工作时，郭知道我们在监狱中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省政策”的。郭早年曾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坐牢多年，后投靠了阎。我同他在草岚子监狱见面时，开始还不知道他已是阎的人，曾告诉他党组织正营救我们出狱，他回去时把这个情况报告了阎。后来，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组织部长张厉生也一再向阎锡山通报过我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阎那时已倾向于抗战，他正想利用一些共产党员，把牺盟会办得有点声色，替他打开点局面，完成所谓“保晋大业”，以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阎锡山自信他能在这局险棋中赢得最后胜利。我们也明明知道，阎锡山不可能同我们真正走一条路，同

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的暂时同盟，我们要在合法斗争中，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也深信，依靠党和群众的力量也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我们同阎锡山合作，要在阎锡山的地盘上和组织里工作并发展抗日力量，就一定要取得阎的信任。阎为人狡猾，城府很深。怎样办？我们尽量采取以诚相待的态度。我们不回避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当然也不公开讲明。我们常说有的事要同“远方朋友”商量，我们用了不少“远方朋友”介绍来的人，阎锡山清楚这都是怎么回事。一九三七年初，我经过北方局向党中央要来陈玉堂、苏鲁、孟庆山、黄振荣、白书棋等十位红军干部，放在“太原军政训练班”由周仲英同志管的那个连，被梁化之发现了。他气急败坏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明确告诉他，要来的这些人是红军干部，是请他们教学员们打游击战的。阎知道后，没有责难，认为我们讲真话，不骗他，可以共事，反而比较放心了。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工作初期，我们是十分谨慎的，尽可能地说“山西话”，使用阎锡山“创造”的比较进步的名词，办山西当局所允许办的事。赵戴文曾当着阎的面提出，要求我不要挖山西当局的墙角，我们表示同意，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在山西当局的政府和军队中发展党员。当时这样做做对了，它便于我们取得合法地位，否则就站不住脚。

如何对待和处理戴“山西帽子”和“官办团体”问题，是这个阶段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曾有过

争论。在我们接手牺盟会之初，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官办团体”不能发动群众抗日，力主把牺盟会更名和改造为抗日救国会，把由我们组织起来的山西抗敌救亡先锋队，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没有照办，引起了争论。刘少奇同志得知后，明确指出：牺盟会的好处恰恰在于它是“官办”的，否则就不会让我们放手工作；把牺盟会和抗敌救亡先锋队改为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阎锡山不准许，我们不能那样办。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张友清同志汇报工作时曾代表我们两人提到这个争论过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批评了那种反对“官办组织”的意见。决死队建立不久，又有的同志坚持说，戴阎锡山的“帽子”是违反独立自主原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反对了这种意见。他们强调指出：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戴“山西帽子”；戴这顶“帽子”对于我们没有妨碍，而且有许多便利。

在抗战以前的这个阶段，当时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最后形成，我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公开工作委员会审时度势，小心谨慎地运用阎锡山的进步口号开展工作，着重反对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十分注意团结阎锡山，推动他走向抗战。斗争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拉阎锡山后腿的“山西省主张公道团”等右翼力量。我们正确地运用“山西形式”（即戴“山西帽子”）和充分利用牺盟会这个“官办团体”，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二阶段的大发展，大致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二月。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当年八月，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示全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北方局随即向我们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遵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要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不要怕破裂，要切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时，合作才能持续下去。当时，我们正在准备并已开始大刀阔斧地干，北方局的指示使我们更加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给了我们有力的推动。

抗战开始后不久，日军很快地就侵入山西。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中央军，相当一部分一触即溃，或者闻风而逃，而牺盟会和刚刚成立的决死队则在各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军。这时，阎锡山在日军进攻下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对旧军已失去信心。他寄希望于牺盟会和决死队来帮他支撑和扭转山西的危局。在雁北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临汾会议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可以说是阎锡山进步倾向最为明显的时期，我们提出的意见，他一般都能采纳，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支持也比较多。

在这个大发展阶段，公开工委坚决而又策略地执行了洛川会议精神。我们及时地转变了工作方针，把主要反对关门主义，改变为主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在继续保持同

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的条件下，实行独立自主原则，并且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组建和扩大新军方面。这一重点转移，是有战略意义的。在当时，掌握和扩大武装这件大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高于一切。同时，我们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成立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在敌后建设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牺盟会在这些方面所进行的颇有成效的工作，为八路军进入山西，迎击日本侵略军和创建根据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八路军的到来和英勇地向敌后进军，又极大地振奋了山西人民和全国人民，强有力地支援了山西公开工委领导的斗争，对牺盟会工作的开展和山西新军的壮大，对山西抗战形势的扭转和发展，无疑起着十分巨大的以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和山西各级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以主力部队作坚强后盾，到一九三九年夏，以牺盟会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农救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七十万人，工救会会员发展到二十万人，妇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青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这时，包括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的全体会员总数已经发展到三百万人左右。同时，在山西省的七个行政区中，有五个行政区及行政区所属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另外两个行政区里，我们也掌握了部分县政权。全省一百零五个县中，有七十个县县长大都由牺盟会特派员担任，也有从新军中抽出干部担任的，实际上都是共产党人。他们担任县长后，进一步改造了区、村政权。这时，地方党委，主要是县委，大都建立

起来了，以上这些工作地方党委做得更多些。

这期间，山西新军有了迅猛的发展。到一九三九年夏，已有四个决死纵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一个暂编师（由战动总会组建的），三个政治保卫旅，共辖五十个团，其中有四十六个正规团，约五万多人，实际兵员超过了当时的山西旧军。这支抗日武装，分别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等地区，依靠军民结合的伟大力量，在八路军的强大支援和直接指挥下，阻击日军进攻和反围攻，进行大小战斗上千次，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保卫了人民，并且锻炼了队伍，提高了战斗力。

以反对阎锡山妥协倒退和粉碎“十二月事变”为主要标志的第三阶段，大约是从一九三九年二月到一九四〇年春。在这一阶段，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是继续抗日、继续团结、继续进步，还是投降、分裂、倒退这个根本问题上。当时最紧要的是山西新军的领导权究竟由谁掌握，斗争十分尖锐。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北方局的指示，山西公开工委和山西各级地方党委正确地运用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依靠群众力量，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确保了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切实掌握了民主政权，巩固并扩大了已经取得的胜利。

随着工作的展开和斗争的深入，北方局曾经一再提醒我们：要经常想到阎锡山惯于在政治上翻云覆雨，既要积极争取他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又要防备他在形势逆转时可能反水。

进入一九三八年以后，新军配合八路军不断打击和箝

制敌人，逐步稳住了山西的局势。这时，阎锡山看到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新军、牺盟会逐渐形成独立力量，他不把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认为超越了他所许可的范围，他感到控制不了了。于是，他下决心要取消决死队、牺盟会以及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各进步群众团体。他从当年二月的临汾会议开始，一步步地走下坡路。八月间，他在吉县的古贤村召开的会议上，就策划“收回”新军，重整旧军。他提出煽动性的口号，鼓励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说什么：“农民是一只老虎，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善为政者须手执电鞭而发动之，既不蹈虚，又不为乱，使群众尽为我用”，“临渴挖井，小事大做亦无益；未雨绸缪，大事小做亦成功”，“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如此等等。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当局在全国酝酿着一股反共投降逆流。三月下旬，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把他早已暗下决心采取的倒行逆施公开化了，公然说什么：“不能抬着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先生（汪精卫）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投降论调，受到我们的严厉驳斥。在会上，他提出取消决死队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夺取新军的领导权，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他的反动措施，受到我们的坚决抵制。

在秋林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山西公开工委的成员和牺盟会、山西新军的领导同志，开过几次会，并利用散步机会，以“闲谈”方式，碰过多次头，做了应变的具体部署。

向各新军和各牺盟中心区、各专区、各县政权的负责人打了招呼：要不怕翻脸，不怕破裂，回去以后要牢牢掌握部队，掌握政权，保住枪械，保住财粮，特别是要抓紧时间把顽固的反共旧军官从新军中坚决清除出去。

与此同时，雷任民同志从秋林返回晋西北时，曾受八路军办事处的委托，绕道延安向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听汇报时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现在是天下大乱，到处为王。意思是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要敢于打开新局面。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阎锡山“命令”决死队第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让旧军紧跟背后“配合”，想与日军对二纵队两面夹击，消灭二纵队。韩钧同志警觉性很高，拒绝执行，电阎陈说道理，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即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于是，开始了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发动的最大进攻。

“十二月事变”刚刚爆发的时候，中央军委即指出：这次“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战斗一打响，我决死二纵队、二〇九旅在新军各部的强大声援下坚决还击。在晋西北，决死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等新军各部也先后投入了反对顽固派的战斗。在晋东南，处境险恶的三纵队，由于应变措施不力，受到严重

损失，但有些部队血战到底，冲出了重围。一纵队也协同主力部队打退了蒋、阎勾结的进犯。在北方局的帮助下，二一二旅、二一三旅突破日顽封锁，转移到晋东南，与决死一纵队会合。在整个战斗过程中，除个别部队如陈士榘支队直接参战外，我八路军象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新军后面，阎锡山不得不顾忌这个威慑力量。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阎锡山发动的这次事变终于被粉碎了。

阎锡山在“十二月事变”中玩火自焚，招致惨败。他的十九军、六十一军，特别是骑一军、三十三军等主力部队，都遭受重大损失。除了由他派到决死三纵队的反动军官拉走该部的三个总队以外，别无所获。

在秋林的牺盟总会，在“十二月事变”发生后，也用各种方式同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把绝大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全地撤了出来，有一批干部和学员撤到陕甘宁边区。牺盟总会原来是和第二战区政治部在秋林一起活动，“十二月事变”后，在顽固派的重重压迫下实际上已不能再在那里开展工作。

这里，应当着重指出，在“十二月事变”前后，为促使阎锡山悬崖勒马，继续抗日，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山西省委、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奉党中央指示，做了仁至义尽的规劝和争取工作。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指示以我的名义致电阎锡山。电报中说：“为今之计，亟宜有钧座调和，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二十五日，我党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同志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到达秋林，